

基于决策效应最大化的科技 英语长难句翻译过程研究

孙琳

(海南医学院,海口 571101)

摘要: 结合译者主体性和决策科学的相关知识,本文采用综合的认知理论分析模式,对科技英语长难句的翻译过程进行探讨,以全新的视角提出科技翻译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译者为中心,以实现决策效应最大化,即实现译文质量最优化的决策过程。

关键词: 决策; 最大化; 长难句; 翻译过程

中图分类号: I 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2-0086-06

The Study of EST Long and Complex Sentences Translation Process Based on Decision Effect Maximization

SUN Lin

(Hainan Medical College, Haikou 571101, China)

Abstract: With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nd the relevant knowledge of decision scie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EST long and complex sentences translation by means of cognitive analysis model. From a brand new perspectiv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EST 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plays a dominant role and makes decis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effect of decision, or the optimization of translation quality.

Key words: *decision; maximization; long and complex sentences; translation process*

翻译领域一直以来对于翻译结果的讨论多于过程,但是从整体上、宏观上研究翻译就不能忽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将翻译作为一种过程进行研究,实际上是探讨双语转换的认知心理过程。当代翻译学的研究表明,原文不是翻译面貌的唯一决定因素,译文面貌也不是唯一值得探

讨的翻译问题。翻译就是译者不断做决定和进行取舍的过程。从翻译标准的界定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到译文在目标文化中的地位和功能,都取决于译者的判断和选择,而译者的选择又离不开目标文化之内和之外的其它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和制约^[1]。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科技交流的

*收稿日期: 2010-10-15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L011)

作者简介: 孙琳(1986),女,湖北黄冈人,海南医学院外语部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日益频繁, 科技英语翻译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既然如此, 科技英语翻译的质量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而对科技英语翻译过程的探讨也是势在必行的。在此背景下本课题应运而生。

一、翻译过程研究综述

在翻译活动的心理过程研究中, 学者们做出了各自的思考和探索。著名哲学家 Wittgenstein 曾把翻译过程看成“由一语言到另一语言的游戏过程”^{[2]7, 23}。捷克著名学者 Jivi Levy 首次将 Wittgenstein 的“语言游戏”概念运用于翻译研究, 并指出:“翻译即是作出决定——犹如棋手在下棋时根据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情况做出决定, 移动棋子。译者也是如此, 面对一系列被选项, 必须做出决定”^{[3]1171}。Ali Darwish 在“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 View of Mind”一文中把翻译视作“一个连续不断的决策过程(a continuous decision making process)”^[4]。Roger T. Bell 认为翻译理论所设定的目标就是翻译过程的模式化。翻译过程可以体现为串联式和互动式, 包含三个主要阶段: 句法、语义和语用处理。这三个阶段都参与了分析与合成^{[5]13, 60}。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必须置于对译者的认知心理研究之中, 尽管以上种种探索性的翻译过程模式具备一定的解释力, 但它们尚未经现实检验, 仍存在各自的局限性。而对翻译过程进行更科学、更现实的研究仍是翻译研究者面临的挑战和考验。

二、决策效应最大化的翻译过程阐释

1. 期望效用理论

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 EU)理论最早是由 Daniel Bernoulli 在 1738 年提出来解决 St. Petersburg paradox 的。EU 理论认为, 假如决策者选择风险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符合效用公理, 那么他一定是选择期望效用值最大的那项备择

方案^[6]。对应期望效用理论, Savage 在 1954 年提出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SEU), 该理论认为决策备择方案的选择遵循主观效用最大化的原则^[7]。

本文引入该理论是为了指出翻译的目的, 即达到决策效应的最大化。对于译者来说, 翻译行为首先是对于原文的准确理解, 否则将误译或翻译过程被迫中断; 其次是对译文的准确表达, 否则将误导读者致使翻译失败。而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和表达都涉及到译者的决策行为, 且译者就是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做出各种决策, 其目的就是要达到决策效应的最大化, 亦即译文质量最优化。

2. 译者在主体间性中的主体性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 关于翻译主体性的问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而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融合是当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趋势。主体间性理论提出了翻译主体应有的本真存在, 在并不否认翻译主体的主体性存在的同时, 希望建立译者主体与其他主体的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共在^[8]。谭载喜指出, 翻译说到底是一项人类的活动, 翻译过程中的一切决定最终都是由译者这个人来做出的。然而, 译者在进行抉择的整个过程中, 始终都会受到各种因素, 包括种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译者的最终抉择权无疑也只是一种相对的, 而非绝对的不受干预的权利^{[9]248}。

本文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行为是其作为主体在主体间性中发挥主体性, 其目的是要达到决策效应的最大化, 即使译文质量达到最优化。为了实现决策效应的最大化, 翻译过程应该是译者作为中心, 与翻译中其它各主体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 并充分考虑翻译过程中的其它影响因素的一种博弈过程。

3. 标准与方法的建构

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翻译研究过程进行探讨, 以全新的视角提出翻译决策作为特殊的思维活动, 难以用精确量化的方法来评价, 所以应突破二值逻辑、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 即翻译过程

不是机械的理性建构过程,而是在翻译主体参与下合理的文本建构过程,翻译总体上是一个“非精确的综合判断”,是一个通过认知思维整合的模糊化决策过程。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翻译决策过程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决策效应最大化,是在各种约束允许的范围内做出最佳的选择,但是这个最佳选择是在特定因素的制约下做出的,如果考虑其它影响因素,该选择则不一定是最佳的。因此我们在此使用“最大化”旨在说明没有绝对的最佳翻译,只有在特定因素制约下做出的最佳选择,从而产生最佳的翻译,而这种最佳也是相对的。可以说,没有最好的翻译,只有更好的翻译。

目标提出来了,那怎样去实现呢?这就涉及到方法的构建了。上一节指出译者是在主体间性中发挥其主体性,译者在翻译中的决策行为还要受到其它翻译主体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除了译者的翻译目的、思维、文化价值观、审美情趣之外,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东西方民族思维模式、原文作者的意图、读者接受、社会等因素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译者的翻译决策行为。因此,以上这些因素在我们的翻译研究中也要考虑进去。只有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才能对翻译研究进行全面、科学地探索。

4. 决策效应最大化下科技英语长难句翻译过程研究

科技英语(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EST)作为一门学科始于上世纪70年代,随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广泛,科技英语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英语语体,已经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而以上所述翻译过程研究的阐释同样适用于科技英语翻译过程的研究。

一般认为被动语态、名词化结构和长难句的广泛使用是科技英语的重要特征,而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科技英语长难句的翻译过程。科技英语是用来陈述自然界、科技界所发生或出现的事情,描述其规律、特点、过程等的语言^[10]。其作用是陈述事理、描述过程,它所给出的定义、定理、定律或描述的概念或工艺过程,都必须严谨、精

确,因而科技英语逻辑性强、结构严密、表达明确。这些特点规定科技英语必然带有许多修饰、限定和附加成分。这些成分一多,句子必然就长,所以,说科技英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句子长是很有道理的。

例1. You must fix in mind the symbols, formulas, definitions and laws of physics, no matter how complex they may be, when you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m, in order that you may understand the subject better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

译文1. 你必须牢记物理学符号、公式、定义和定律,不管它们有多么复杂,当你和它们接触的时候,以便你可以更好地理解这项课程,并为今后进一步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

译文2. 为了更好地理解物理学过程,为今后进一步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当你接触到物理学上的符号、公式、定义和定律的时候,不管它们多么复杂,你都必须牢牢记住它们^[11]。

英美文化的思维模式是理性、抽象的,而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则是感性、具体的。英语习惯于开门见山,主次分明,将最重要的事放在句首或段首,而汉语习惯于从次要的事讲起,最后才进入正题。这是文化因素在语言特点上的体现。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就应该考虑到这种文化影响因素。这个句子由四个分句组成,是一个主从复合句。You must ...physics 是主句, no matter how ...may be 是让步状语从句, when you ...with them 是时间状语从句, in order that 是目的状语从句。三个从句都是说明主句的谓语的。这个句子有四层意义:一、你必须记住物理学的符号、公式、定义和定律;二、不管它们多么复杂;三、当你接触到它们的时候;四、为了更好地了解物理学和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弄清了几个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意思以后,译者就可以按照译文的逻辑习惯翻译出各个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汉语的习惯,整个句子的翻译应采用变序译法,也就是说,先译第四层,再译第二层和第三层,最后译第一层意思。只有这样译文才能明确的再现原文的

逻辑意义, 并符合译文的表达习惯。很明显, 第二个翻译优于第一个翻译逻辑清晰, 意义明确, 而且更加地道, 实现了决策效应的最大化。

例 2. The parameter space of the camera is divided into a controllable subspace consisting of its height and depression angle, and an uncontrollable subspace consisting of the tracked object coordinates and rotation angle errors.

译文 1. 摄像机的参数空间分为包括摄像机的高度和俯角的可控制的子空间和包括被跟踪目标的坐标旋转角误差的不可控制的子空间。

译文 2 摄像机的参数空间分为可控制的子空间和不可控制的子空间。可控制的子空间包括摄像机的高度和俯角; 不可控制的子空间包括被跟踪目标的坐标旋转角误差^[11]。

英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系,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而英语属于印欧语系, 因此汉语在语法上呈现隐形, 而英语语法呈现显性。语法上的隐性或显性是指是否使用了标识词。而在语言特征上则表现为英语重形合, 通过语言形式(词汇或句法)连接词和句子, 而汉语重意合, 词与句子是通过隐含的逻辑关系联系在一起。英语注重语言形式间的衔接, 而汉语注重意义的连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语中多带有介词和从属结构的长难句, 而汉语多小句和简单句。而且, 东方民族的整体思维模式和西方国家的分析思维模式对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也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说, 历史和社会文化因素对译者决策行为也会产生影响。本例是一个简单句, 主句的宾语有两部分, 即 a controllable subspace 和 an uncontrollable subspace, 这两个宾语都带有一个由分词短语 consisting of 引导的后置定语, 可以看成是非限定性定语, 进一步说明这两个子空间。比较两个以上两个翻译, 我们很容易能看出第二个翻译明显优于第一个。根据汉语习惯, 翻译时可以先总述再分述。有时长难句中的从句或分词短语与主句的内容联系不密切, 具有相对独立性, 往往可以把短语或从句译成短句, 并酌情增添适当的词语, 以使汉语译文语气连贯, 逻辑关

系密切。若依次翻译, 会使译文显得松散, 不容易给人以清晰的印象。

例 3.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tained decomposition gas might become the cause of reducing the purity of the metal oxide coating adhered to the ribbon glass in the case the aforementioned decomposition gas is not thoroughly removed from the spraying locale.

译文 1. 从另一方面来说, 留下来的分解气体会使粘附在带玻璃表面上的金属氧化膜的纯度降低, 如果上面提到的分解气体在喷射处没有被彻底地清除掉。

译文 2. 从另一方面来说, 如果上面提到的分解气体在喷射处没有被彻底地清除掉的话, 那么, 留下来的分解气体会使粘附在带玻璃表面上的金属氧化膜的纯度降低^[12]。

正如例 1 所述, 西方民族的思维更加开门见山, 习惯于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句首, 而汉语则相反, 通常是重心后置, 从不重要的信息开始叙述。因此, 在英语中的条件句中, 承载着最重要信息的主句习惯于放在从句之前, 而汉语则是先条件后结果。这是一个复合句, 主句为: 主句(the detained decomposition gas) + 系词(might become) + 表语(the cause of reducing... ribbon glass)结构。case 后边为省略了 that 的同位语从句, 修饰 case。in the case 为介词短语, 在这里表示条件, 意思为“在...”的情况下。该句有两层意思, in the case 以前为第一层意思, 表示可能产生的结果; in the case 以后为第二层意思, 表示产生结果的前提条件。而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应是条件在先, 结果在后。因此, 翻译时就应该考虑到这种文化因素以及东西方思维差异, 对译文进行适当的调整, 以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第二个翻译做到了意义上忠实于原文, 而且更加为译文读者所接受, 可以说实现了译文质量最优化。

例 4. Perhaps the factor that makes a positive outcome most likely is the clear recognition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community that there is an overriding need for inno-

vation, and a wide agreement that the national interest requires that major effort be concentrated in this area.

译文1:很可能导致积极结果的因素是日本政府和企业社团的清晰认识,即创新是压倒一切的需要,而且人们民族利益要求集中对这个领域进行巨大的努力。

译文2:日本政府和企业社团清楚认识到创新是压倒一切的需要,而且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利益要求集中对这个领域进行巨大的努力。也许上述这些认识就是很可能导致积极结果的因素^[13]。

译者的价值取向、职业道德以及社会责任感也会对译者的决策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翻译英语长难句之前,理清原文内在的逻辑关系是及其重要的。只有再现原文的逻辑关系,译文才能忠实于原文。对于结构复杂,层次纷纭的主从复合句,要抓住引导各种从句的连词,弄清各种从句的性质,这样就能掌握全局结构,分清主次。该例是“美国科学家”杂志分析战后日本工业迅速发展原因的一个句子,结构相当复杂。正确理解此句的关键在于弄清作为连词的四个“that”。第一个that因其后紧跟谓语动词makes,是关系代词,引导定语从句,并在从句中做主语,其先行词为the factor。第二个that单纯是个连词,在从句中不做任何成份,引导同位语从句there is an overriding need for innovation,这个从句与the clear recognition同位。第三个that也是引导同位语从句的,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this area与a wide agreement同位。但这第二个同位语从句中,又包含了由第四个that引导的宾语从句。弄清这四个that的作用,全句结构就清楚了。因为去掉这些从句,就剩下主句“the fac-

tor... is the clear recognition, and a wide agreement...”。弄清句子的结构以及主句与从句的关系,就可以进行翻译。从意思上来说,该句主要表达一种因果关系。按照东方民族的思维习惯,应该先说明原因,再说明结果,使原本复杂的长难句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比较以上两个译文,很明显译文1逻辑混乱模糊,而译文2则逻辑清晰明朗,实现了译文质量最优化。

可见,在翻译科技英语长难句的过程中,重点首先应放在对原文逻辑结构关系的分析上,因为理清原文逻辑关系意义是正确翻译的前提。在译文的组织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译者的翻译目的、思维、文化价值观、审美情趣之外,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东西方民族思维模式、原文作者的意图、读者接受、社会等因素。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做出最佳的选择,实现决策效应最大化,译出优质的译文。

四、结 论

将翻译过程研究与翻译主体研究相结合,从决策科学、心理学的角度对科技英语长难句翻译过程的发生、发展进行探讨,并希望通过影响该过程的因子的研究分析从而建构基于效应决策的认知翻译模式,并尝试将该模式应用于实际以期产生较好的理论及实际意义。摒弃传统翻译中的二值逻辑和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本文以全新的视角提出翻译决策作为特殊的思维活动,难以用精确量化的方法去评价,翻译的过程是译者为中心参与下合理的文本建构过程。本文提出的翻译的性质及翻译过程的研究是能够对翻译研究作出新解的理论范式。

参 考 文 献

- [1] 刘艳. 译者主体性的文化界定: 再读吉里·列维的《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哲社版, 2007(4): 65-67.
- [2]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3.
- [3] JIŘÍ Levý.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 [M] // To Honor Roman Jakobson. The Hague: Mouton, 1967.
- [4] ALI Darwish.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 View of the Mind [C]. Victoria College, Melbourne, Australia, 1989.

- [5] BELL, ROGER 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 New York: Longman Inc. 1991.
- [6] 周国梅, 傅小兰. 决策的期望效用理论的发展[J]. 心理科学, 2001(2): 219-220.
- [7] 郭文英. 期望效用理论的发展[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5(5): 11-14.
- [8] 葛校琴. 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9]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增订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0] 陈桂琴. 科技英语长句翻译方法例析[J]. 中国科技翻译, 2005(3): 5-8.
- [11] 武学民, 金敬红. 科技英语翻译中的长难句处理[J]. 中国科技翻译, 1997, 10(4): 26-29.
- [12] 于建平. 科技英语长句的分析及翻译[J]. 中国科技翻译, 2000(3): 14-16.
- [13] 孙新法. 谈科技英语长句的理解与翻译[J]. 中国科技翻译, 2008(4): 10-11.

(上接第 81 页) 了该诗的悠远的意境。坡还将诗中的乌鸦描述为远古的(of yore , ancient) 乌鸦……

爱伦·坡的诗包涵更多的“过去”, 借助于典故, 借助于用词。爱伦·坡将读者带到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遥远的美妙世界。

四、结 语

爱伦·坡在诗歌创作方面注重美。他的诗歌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诗歌的审美追求上都具

有超前性和独特性。“他没有像同时代美国浪漫主义诗人那样钟情于对大自然山水花鸟或边疆野趣的沉思和遐想。他的诗歌想象多驰骋于古典的欧洲情趣以及难以捉摸的天外世界或荒诞的内心世界”^{[3]261}。在诗歌的纯粹“美的形式”和“无限的暗示”中找到自己表达的特殊方式。W·S·毛姆说:“爱伦·坡写下了美国前所未有的最美丽的诗歌……诗歌给予你的纯粹是美, 它们的美是无可比拟的”^{[6]116}。

参 考 文 献

- [1] 杨岂深, 龙文佩. 美国文学选读[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2] 姜涛. 美国诗歌赏析[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6.
- [3] 张冲. 新编美国文学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4] 桂杨清, 吴翔林. 英美文学选读[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 [5] 辜正坤. 英文名篇鉴赏金库: 诗歌卷[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 [6] 俞亢咏. 毛姆随想录[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